

论中国古代出版的精神内核、传承逻辑与当下启示*

□文 | 王剑飞 万安伦

[摘要] 中国古代出版有着独特的中国元素，其中蕴含着独有的精神内核，至今影响着出版传承、文明赓续，同时形塑着中华文化的风貌。从“记功续绝”的个体追求到“镂月裁云”的出版工艺，从“盛世修典”的出版传统到“革故鼎新”的技术追寻，中国古代出版以其独有的风貌，不断传承至今。数智时代扑面而来，各类出版信息应接不暇，我们出版事业的发展依然赓续着古代出版精神内核，要坚持推崇“敬惜字纸”的文化传统，加强“种子基因”的内容筛选，夯实“三复校正”的出版编校。

[关键词] 中国古代出版 精神内核 出版传承

“一部出版史，其实就是一部人类的文明史。”^[1]出版是人类文明传承和传播的工具，无论在东方还是西方，都有着惊人的相似之处。比如在出版载体上，都经历了由硬变软，由大变小，由宏变微，由承载较少的信息量到承载海量的信息量的发展过程。^[2]

时至今日，人工智能技术正推动全球出版走向数智化新阶段。而中国出版却始终葆有一份别样的特质，有着鲜明的精神标识和物质载体，从古代绵延至今。出版载体的竹简木牍、绢帛宣纸，出版符号的方块汉字，出版技术的造纸术与印刷术……都是中国古人对人类出版的重大贡献。独特的出版特征肌理，让中国人在此基础上形成对出版的独特认知与价值判断，影响着出版传承与文明赓续，形成了具备中国特质的精神内核。本文尝试对中国古代出版的精神内核进行探析，考察其如何以自身的特质进行传承，并由此探析对今天出版业所带来的重要启示。

一、中国古代出版的精神内核

1. “尊礼崇德”的道德追求

中国古代对于出版物内容有着极高的道德准则

和要求，出版物也是承载道德追求的重要载体。中国古代主要是受儒家思想的影响，先秦儒家“道德的政治”思想，实质就是以“道”与“德”作为核心价值追求和理想。古语中所谓“三不朽”，头一条便是“立德”。出版的文学作品，特别是古代诗歌，是对人进行道德品格熏陶的重要内容。《论语·泰伯》中，子曰：“兴于诗，立于礼，成于乐”。其所指就是，人的道德修养首先来自诗歌等文学作品。出版物对“礼”和“德”的价值不言而喻。历朝历代，对出版内容和出版品格的高要求就成为“尊礼崇德”的表现形式之一。不少朝代也为此专门实施了针对性管控措施，来保证出版内容的道德品格。

孔子一生强调道德，倡导“仁者爱人”“克己复礼”以实现“博施于民，而能济众”的人生理想。《论语》中有大量讲述道德及其重要性的句子。例如，子曰：“苟志于仁矣，无恶也。”“有德者，必有言；有言者，不必有德；仁者，必有勇；勇者，不必有仁。”道德尊崇在各类出版中成为普遍追求。出版物不仅可以传播，更追求传世。按照儒家思想，有些内容可以传播，有些东西则不适合传播传承。关于道德、礼仪这些具有成风化人内容的东西，可

* 本文系国家社科重大项目“数字人文背景下的重大历史典籍版本保护研究”（24&ZD234）、安徽省哲学社会科学规划课题“安徽当代文学期刊的数字出版场景化研究”（AHSKY2024D071）阶段性成果

以不断传播,但是诲淫诲盗的东西、影响统治者利益的内容,则进行必要管控。

经学研究的核心著作、被历代儒家学者作为经典的“十三经”更是对“尊礼崇德”出版精神内核的重要诠释。其中,《尚书》是夏、商、周时代一些文献和传说资料的汇编,后来成为儒家宣扬二帝、三王及周公、孔子治道的圣典,其中展示的是古之圣贤和帝王之德;《仪礼》是现存最早记载古代礼仪的书;《礼记》则进一步论述了典礼制度的意义和作用,从理论上阐述了儒家的“礼治”思想。由上可见,对“十三经”的出版、传承、注疏等活动一直是文化出版活动的核心主题,其精髓就是“尊礼崇德”。

2. “教化天下”的价值期待

自古以来,中国出版就承载了独特的文教作用和价值,非常重视“以文教化”之功能。《周易》中提到,“观乎天文以察时变,观乎人文以化成天下。”也就是,观察天道运行的规律,以此来认知时节的变化。注重人世伦理道德,用教化推广于天下。具体体现之一就是古代科举制度,它深刻影响了图书出版的内容、数量和类型,对古代出版事业影响巨大。

“非为利也”的官刻是“教化天下”的又一体现。官刻是指由国家部分出资组织雕版印行的图书。《续资治通鉴长编》卷九十中提到宋真宗就针对国子监卖书给予批示:“此固非为利也,政欲文字流布耳。”国子监是国家最高的文化教育机构,《宋史·职官五》记载了其职能“掌印经史群书,以备朝廷宣索赐予之用,及出鬻而收其直以上于官”。其印书主要是供朝廷人员使用参考,向社会售卖,不以营利为目的,且发行面广、量大,客观上起到了思想传播、普及文化的良好作用。

其次,国子监作为中国古代高等教育机构,担负着重要的文化传播和教育功能,其最重要的一项是勘定出版物。这项工作由博古通今的学者担当,由他们勘定当时的权威“教材”。“作为国家最高教育机构,国子监无疑具有人才优势。”^[3]比如宋初《五经正义》主要为善楷隶的赵安仁所书,经常成为地方翻刻的蓝本,被誉为“京师本”。

中国古代书院及其图书收藏便是这一追求的具体呈现方式。早期书院主要活动就是典籍收藏和管理,到了宋代,书院发展成为较完善的教育制度,并由政府扶持和倡导。南宋时期的书院数量空前,

不仅是典籍收藏整理中心,而且成为教育和学术的中心。宋代最负盛名的有湖南岳麓书院、江西白鹿洞书院、河南应天书院等,成为藏书、教学和研究三结合的高等教育机构,承载着教化天下的功能。

3. “博大精深”的出版内涵

中国古人对于出版的尊崇,对著书立说的追求,在不断发展的出版事业与活动中,慢慢衍生出一套完整系统的学科,即出版编校体系,在古人出版编校实践中不断走向精细,走向“博大精深”。

首先是追求出版形式美。对于出版装帧、内容格式等,古人进行了较多探索,并形成系列规范。随着出版载体从硬质到软质的过渡,从形制的角度,可分为汉代造纸术发明前,竹帛并行时期的简牍制度;汉代到唐代的写本时期,是卷轴制度;唐代印刷术发明之后为印本书时期的册页制度。从装订形式来看,先后出现了简册、帛书卷子装、纸书卷轴装、经折装、梵夹装、蝴蝶装、包背装、线装等种类。从版式上,也有天头、地脚、象鼻、鱼尾、边栏、界行、版心、中缝等。细分概念尽管庞杂,但却是古代文人的基本常识。

其次体现在强调出版研究规范性。古人对于出版极度重视和无比尊崇,衍生出一门学科,这就是研究中国古代整理文献方法的学科,即校勘学。广义校勘学包括版本、校勘、目录、考证等多个方面。校勘学始于汉,成于宋,大盛于清。先秦时期的古籍中就有相关记载,西汉刘向父子在整理皇家所藏书籍中进行了实践,编纂了《别录》和《七略》。章炳麟说:“刘向父子总治《七略》,入者出之,出者入之,穷其原始,极其短长,此即与正考父、孔子何异?辨次众本,定异书,理讹乱,至于杀青可写,复与子夏同流。”^[4]此外,中国古人最早建立了目录学,有了图书分类,清代学者王鸣盛就认为,不通汉艺文志,不可以读天下书。

从形式之美到内在规范,早已成就博大精深之学问,这也成为中国出版内核的一大独特景观。然而,“述而不作,信而好古”,也导致了抱残守旧的固化思想。

4. “文心雕龙”的出版匠心

《文心雕龙》是南朝文学理论家刘勰的著作,是现存最早的中文综合性文学批评专著,它对文艺理论发展以及后世文学创作产生了深远影响,对出版的文章提出了高标准要求。“文心雕龙”一

词，其意为写文章要有为文之心，雕龙画凤，要有匠心。文人眼中的书，就像是木匠手中的雕刻，雕龙就意味着杰作。刘勰以“雕龙”来比喻写书，将其认定为极其重要且神圣之事。他指出，《文心雕龙》就是“言为文之用心”的书。《序志》篇首即说：“夫文心者，言为文之用心也……古来文章，以雕辇成体，岂取骏爽之群言雕龙也。”^[5]

“文心雕龙”成为中国古代人对于写文章的自我要求与追求。文章千古事，得失寸心知。著书立说为千古之大业，不朽之圣器。文章靠出版物来承载，从而成为传承教化天下的“物”。“雕龙”就是让文章“雕辇成体”成为出版物。“雕”的本意是指“在竹、木、玉、石、金等器物上镂刻花纹和图案”^[6]。这里的“雕”分有形和无形两方面，无形则是文章，有形则是出版物，与雕版印刷的“雕”也是内在相通，逻辑一致。《文心雕龙》还用雕刻的“刀”来比喻写作的笔，而此时的雕版印刷已经产生，文章最终出版离不开雕刻之“刀”。

由此，“文心雕龙”的出版匠心早已镌刻在中国出版人心中，也成为后世为文的标尺与要求，成为重要的精神内核表现之一。

5. “考镜源流”的出版辨正

“考镜源流”也是中国出版精神中独具特色的内核之一。它体现了中国的学术文化对于知识出版的溯源性、系统性和传承性的高度关注。清代章学诚在《校雠通义》这部作品中，将传统目录学的功用定性为“辨章学术，考镜源流”。“辨章学术”就是指对纷繁复杂浩瀚的学术脉络进行条分缕析，使其清晰彰显；“考镜源流”则是摄取自古至今学术发展以及出版过的各类史料内容，采取鉴别比较，仔细考证的方法来追溯其源流正变。

中国古代出版文献历史悠久，特别是雕版印刷等技术高度繁荣，书籍在印制出版传播上出现了各种类型的版本。宋代之前，校勘主要以勘定传本、审定篇次、校正文字等为内容，宋代之后则走向了理论化，出现了涉及校勘著作以及相关归纳校勘原则、通例的著作。直到清代，对古籍的规模化整理，逐步构建成为以文字、音韵、训诂为根基，涵盖了目录、版本、校勘在内的学科体系。针对这方面，还涉及文字校勘、史实考订、版本考证、目录编纂、古籍分类、内容体校等古籍出版整理中众多环节。古人对于书籍版本的追求要求极高，从而产生了中

国独有的版本学、目录学等学问。

从目录学看，“考镜源流”强调通过对文献分类、整理和研究来解释知识出版的系统性和传承性；从校勘学角度看，则是更为注重通过对文献版本的比对和校对，来还原出版文献的原始面貌从而探析其本源。出版者可以在纷繁复杂的文献版本中查证真伪，辨别异同，追根溯源。

如何在浩瀚的典籍中探索真相，在溯源、版本和演变中探索知识来源、版本真相，厘清学术脉络，成为中国出版人的重要追求，也是严谨、务实、求真特色出版内核精神的生动诠释。

二、中国古代出版的传承逻辑

1. “巫祝史录”的起源

出版符号的成熟是追溯中国古代出版起源的关键点，也是中国古代出版精神内核发生的起点。文字诞生最早就与神话巫术等内容密切关联，自古就有仓颉造字的神话传说。《吕氏春秋·君守篇》说：“奚仲作车，仓颉作书，后稷作稼，皋陶作刑，昆吾作陶，夏鲧作城，此六人者，所作当矣。”这里的“书”就是文字。

古人认为，文字等出版符号诞生具有神的旨意。东汉许慎在《说文解字》中说：“黄帝之史仓颉，见鸟兽蹄迒之迹，知分理之可相别异也，初造书契。”中国关于出版符号创制源头，几乎无争议地认定为仓颉，对于出版符号诞生的起源描述也充满了传奇色彩。《淮南子》记载了“天雨粟，鬼夜哭”的异象，仓颉也被作为文字之神来崇拜。至今还有众多纪念仓颉遗迹的地方，如仓颉陵、仓颉庙、造字台等。在古人思想中，文字作为出版符号本身就具有祭祀占卜之功用，不仅是人与人之间的沟通工具，同样也是人与鬼神之间沟通的重要媒介。“祭祀时，用文字昭告鬼神来享受祭祀。”^[7]

图书起源同样是来自神话传说“河图洛书”。出版事业的源头在古人眼中充满了神圣感。《周易·系辞上》中记载有“河出图，洛出书，圣人则之”。传说中这个圣人就是伏羲，而“河图”“洛书”也被认为是中华文化文明的最早起源。相传，在河南洛阳东北孟津县境内的黄河中浮出龙马，背有“河图”，并奉给伏羲；传说在大禹时期，在洛阳西洛宁县洛河中浮出了神龟，背负“洛书”献给大禹。

据说正是借助这些神秘图案的“图”和“书”帮助，伏羲画成了八卦，更是推动了后来《周易》诞生。有学者指出，“它是由自然界的天然痕迹——龟甲发展而成的抽象符号，是中国的第一部图书，并认为《河图》和《洛书》在中华文明史上曾起到了重要的启蒙作用。”^[8]

中国古代出版的源头从有关神与巫的讲述中开启，在充满了传奇色彩的叙事中拉开了关于中国出版的大幕，出版中也孕育出天人合一的理念。

2. “记功续绝”的功用

自古以来，中国文人士大夫就有追求“不朽”之理想，这恰恰可以通过出版活动进行，从而完成出版传承。《左传·襄公二十四年》谓：“豹闻之，‘太上有立德，其次有立功，其次有立言’，虽久不废，此之谓不朽。”这里的“三不朽”，对文化人影响深入骨髓，也是古人对人生价值的核心判断。不过，这里的“立德”“立功”对于普通文人来说较为遥远，而“立言”则可以通过自身努力相对容易达到。唐代孔颖达在《春秋左传正义》中说，“立言谓言得其要，理足可传。”于是，“立言”就成了众多文人的第一要务，以此来追求不朽。正如曹丕在《典论·论文》中说：“盖文章，经国之大业，不朽之盛事。”追求身后不朽之功名这一伟大理想，激励着文人不断突破自我，把著书立说及出版当作人生使命。

文人们把立言作为“不朽”，而编书、选本和注解也是表达编者思想的载体。正所谓“诗言志”和“文以载道”，诗与文的出版符号和内容，都通过书得以呈现，如何选编，事关传承，也关乎传播效果。编书同样也是可以追求不朽的伟业。中国古代文学作品的“选”，成为出版史上又一景观。“选”的思路与方向，则往往受时代制约，也会反作用于时代思潮。选本也是“立言”方式，不过显得比较隐晦。鲁迅先生说：“凡是对于文术，自有主张的作家，他所赖以发表和流布自己的主张的手段，倒并不在作文心，文则，诗品，诗话，而在出选本。”^[9]

另一种实现功名传承的方式则是“注疏”。宋朝陆九渊《语录》载：“或问先生：何不著书？对曰：‘六经注我！我注六经！’”其实在对典籍的注解整理过程中，本质上也是文人自我思想的展示。《后汉书》中的《郑玄传》提到东汉后期经学大师郑玄一生致力于注述典籍，虽遭到党禁多年，但矢志不

渝，“囊括大典，网罗众家，删裁繁诬，刊改漏失”，终成一代大家，世称“郑学”。

作为出版主体的文人学者通过出版事业的著书、立说、选编、注解和注疏这一系列行为，完成经典出版物的创作、选编和修订，在出版事业中完成自身价值功用体现，成就文化的传承传播。

3. “镂月裁云”的工艺

中国古代出版物能得以高质量传承的又一关键在于精妙的工艺。中国古代雕版印刷中的“雕”，本身就对雕刻提出了高要求，特色雕刻工艺也是中国古代出版的重要特色。“镂月裁云”出自唐朝李义府《杂曲歌辞·堂堂》中“镂月成歌扇，裁云作舞衣”，指的就是雕工手艺的精妙高超。

古代出版的制版中，雕刻与刀工是最具出版工艺的特质。特别是其短版和拱花等工艺方式，都对刻工提出极高要求。古代刻工要在充分理解作者的绘画表达后展示出“镂月裁云”的刀功。例如拱花法，要把图画轮廓线雕刻在木板上制成拱花。元代刻书多刻花鱼尾。到明代，套版印刷则广泛应用，插图本开始流行。明代长篇小说及戏曲等快速发展，《三国演义》《水浒传》以及《金瓶梅》《红楼梦》等开始出现许多刊印本，“这就给木刻插图提供了远比佛家经典广阔的天地”。^[10]刻工技艺也得到了巨大提升，其刀工要特别精妙。

正因如此，刻工也成为中国古代出版事业的重要群体。徽州刻工便是其主要代表。徽州工匠在雕刻上展示出精湛技艺，徽州刻书业也成为中国出版史上的亮丽风景。安徽歙县虬村黄氏刻工被誉为“雕龙手”。在万历《歙志》卷九《艺能·清艺篇》中记载了其镂月裁云的雕功：“梓人，仇村黄氏独擅。毋论刻字，细书小楷，行草波磔，蚊脚蛛丝之工，即刻白描郭子，花卉禽虫，烟云山水，人物楼台，苔皴界画，如出毫端，非谛视之，不知其为剞劂也。”^[11]雕版印刷时代的成书质量对于版刻有着极高要求，特别是如何把原稿中绘画等作品传神地展示出来，成为关键所在。

刻工们镂月裁云的雕功，让中国传统雕版印刷展示出独特的价值，可以看出，出版产品不仅是文化传承的内容符号，其本身也是精妙的艺术作品。在古代雕版印刷作品中，最具有代表性的是徽州胡正言的作品。他用短版以及拱花法分别在明熹宗天启七年（1627）和明思宗崇祯十七年（1644）刊印

出《十竹斋画谱》《十竹斋笺谱》等作品，成为中国出版史上的瑰宝。胡氏与刻工共同以极为绝妙的手艺，大胆采用了铤版与拱花技术，让出版工艺达到浑然天成的效果，成就了神韵天成的出版史上“活化石”。

4. “盛世修典”的传统

著书立说、修书藏书等出版活动，不光是中国文人个体对不朽功业的追求，历朝历代统治者也把“盛世修典”以及藏书等作为一大历史功德，给予巨大的人力物力投入。长久以来，出版、修缮、藏书以及传承也是一项官府工程。《史记·老子韩非列传》中对老子的记载是：“周守藏室之史也。”他曾经就是周朝的史官，负责收藏典籍等。秦始皇统一六国后，除了统一文字、焚书坑儒，也建立了多处宫廷和政府的藏书机构。宋朝宋太宗时期修书的盛况空前：始则编小说而成《广记》，纂百氏而著《御览》，集章句而制《文苑》，聚医方而撰《神医》；次则刊广疏于《九经》，校缺疑于《三史》，修古学于篆籀，总妙言于释老。^[12]其中，《太平广记》《太平御览》等都是浩大工程。明朝的《永乐大典》是官府修书中最大的一部类书。参加该书编纂和谱写工作的有2000多人，最终完成后“正文部分为22877卷，凡例目录60卷，全书总计3.97亿字，装订为11095册”^[13]。清朝康熙年间也修编了数十部大类书，其中影响最大的是《古今图书集成》，在国外被称为“康熙百科全书”。清朝《四库全书》是我国古代最大的一部丛书，收书达到3461种，79309卷，计9.97亿字，“先后参与编纂的人员多达360人……负责缮写的书工多达3826人”^[14]。修典是历朝历代君王极其重视的出版工程，是赓续文明的重要手段，也是彰显功德的最佳方式之一。

5. “革故鼎新”的追寻

中国古代出版技术是在“革故鼎新”中不断突破发展。纵观历史，中国古代四大发明中，就有两大发明与出版技术相关，分别是造纸术与印刷术，这两项对世界文明发展起到重要推动作用。

造纸术是人类文明史上的重大突破。东汉元兴元年（105），“伦乃造意，用树肤、麻头及敝布、鱼网以为纸”。^[15]蔡伦创造性地利用树皮、麻头等廉价原料，通过“挫、捣、抄”等方式，集中了造纸工人实践经验，改进造纸工艺，使得载体实现了向大众化传播的突破。

印刷术同样是人类文明史的重大突破。隋唐之际，雕版印刷术得到探索运用，工匠以梨木为版，阳文反刻，“雕一版而印无穷”，将“书同文”推向新阶段。以佛经典籍传抄为主要目标，大大扩大了文化传播半径，甘肃敦煌千佛洞咸通本《金刚经》等的发现，都证明了印刷术的成熟运用。北宋毕昇胶泥活字印刷术，则是革故鼎新的重要突破。《梦溪笔谈》中记载：“庆历中，有布衣毕昇，又为活板。其法用胶泥刻字，薄如钱唇，每字为一印，火烧令坚。”毕昇虽只是一介“布衣”，但其改进印刷技艺，发明了胶泥活字印刷术，成为世界出版史上一大功业。这直接影响了后世的王桢首创木活字印刷术，并印制了《旌德县志》。此后的套印、铤版和拱花技术均在世界印刷技术文明史上留下浓墨重彩的一笔。

中国古代出版的“革故鼎新”基因不曾中断。在近代，则有中文打字机艰辛探索，从商务印书馆舒震东到林语堂等，探索着中文出版走向机械化的道路。当代，面对汉字字数和字体繁多、字形信息量大、普通计算机难以存储和快速输出，则有北京大学王选教授团队的不断攻坚克难，实现激光照排技术突破，中国印刷工业彻底告别了“铅与火”。当前人类正迈入智能阶段，以DeepSeek、科大讯飞等产品为代表的中国公司与产品，依然在以“革故鼎新”的出版精神内核，以新质生产力推动中国出版业迈向新阶段。

三、中国古代出版的当下启示

1. 注重“千秋功业”的社会效益

不论是“尊礼崇德”还是“教化天下”，抑或“记功续绝”，中国古代出版的精神内核都是以赓续文化为关键点。古人也通过自己的文字、著述和编纂等出版活动，践行着面向子孙后代的责任与使命。司马迁在《史记》中写下“究天人之际，通古今之变，成一家之言”，就是希望用自己的作品出版，将历史人物、事件和思想编纂、撰写出来，供后世借鉴。范仲淹在《岳阳楼记》中表达了“先天下之忧而忧，后天下之乐而乐”的思想，也传达出中国古人集体的“功在千秋”文人理想。王充在《论衡》中提出：“为世用者，百篇无害；不为用者，一章无补。”他认为著书出版一定要有好作品，要对社会有功用，应当以天下为己任，也表明了优秀出版物的传承价值。

从《诗经》到《论语》，从《道德经》到《资治通鉴》，从国子监到书院，古代的出版书籍与出版机构，都在书籍和出版事业中展示出“功在当代，利在千秋”的风貌特质。

《出版业“十四五”时期发展规划》的基本原则中强调，要坚持把社会效益放在首位。推动双效统一，社会效益优先，积极履行出版社会责任，注重出版的社会效果，弘扬主旋律、传播正能量。这一原则其实就是中国古代出版追求“千秋功业”内涵的现实表现，也是对当今出版业发展的关键启示之一。

2. 推崇“敬惜字纸”的文化传统

中国古代特别是明清以来形成了一个特别的文现象，即“敬惜字纸”。这是指对汉字以及写有汉字的字纸的尊重和敬畏，也衍生为对各类出版物的尊重。这一特色源远流长，早在文字诞生后就有了这一思想。自古以来，读书人都信奉书中自有千钟粟、书中自有黄金屋、书中自有颜如玉。《燕京旧俗志》中记载：“污践字纸，即系污蔑孔圣，罪恶极重，倘敢不惜字纸，几乎与不敬神佛、不孝父母同科罪。”此后，还出现了大量劝人敬惜字纸的善书，所谓“惜字功律”。

《淮南子·本经训》中“昔者，仓颉作书而天雨粟，鬼夜哭”的描述就把造字的仓颉描写为惊天地泣鬼神的盖世英雄，造纸的蔡伦也同样被誉为英雄人物。南北朝的《颜氏家训·治家》中专门提到了要敬惜字纸：“吾每读圣人之书，未尝不肃静对之；其故纸有五经词义，及贤达姓名，不敢秽用也”。^[16]长久的传统，也让民间对于文字及文字纸张的尊崇形成了社会习俗。甚至一段时期内，“惜字会（又称‘字纸会’‘敬字会’‘文昌会’等）、惜字炉（又称‘字纸炉’‘惜字亭’‘圣迹亭’‘敬圣亭’）等遍及全国各地”^[17]。在清代，惜字会提出了不能亵渎文字、妥善处理有字物品、不以文字表达有害内容、采取措施遏制有害文字传播等要求。^[18]习近平总书记2022年10月28日在河南安阳殷墟博物馆考察时也特别指出：“中国的汉文字非常了不起，中华民族的形成和发展离不开汉文字的维系。”^[19]

进入数智出版时代，作为出版基本单元的文字，正从传统纸张转向屏幕，同时也转向语音互动模式，互联网端汉字的使用规范性也正在遭遇严重挑战。譬如一些表情包、互联网符号正对汉字产生冲击，对于文字、文字规范表达以及通用语言文字

的网络使用，成为需要我们高度关注的事情。

3. 加强“种子基因”的内容筛选

习近平总书记强调：“每一种文明都延续着一个国家和民族的精神血脉，既需要薪火相传、代代守护，更需要与时俱进、勇于创新。”^[20]文明的关键在于对优秀传统文化“种子”的呵护与继承。中国古人经典的筛选非常慎重，真正值得薪火相传、代代守护的文明印记、文化符号和经典，都是在精挑细选中完成历史传承。经典作品也在“刊碑立石”中，在大浪淘沙中，淘出经典，进行着优秀作品和出版物的筛选和传承。

进入新时代，中国国家版本馆作为当世的中华文化种子基因库，2019年项目启动，2022年7月23日举行落成典礼，北京、西安、杭州、广州4座版本馆同时揭牌。通过这一当今的重要工程，对中国源远流长的重要文明进行挑选，以经典的版本并以出版物的方式，汇聚到国家版本馆，藏之名山，传之后世。中华民族的精神基因和文化根脉就藏在青铜到丝帛、从简牍到纸张之间，它们也是记录历史、见证文明的“金种子”。

当下随着各类人工智能大模型广泛应用，还有直播、短视频、虚拟现实等种种新型的表现方式，为数字出版提供了广阔的内容生产天地，带来内容产业的爆发，人与机器每天每时每秒都在产出海量内容数据。这是信息过载的时代，也是碎片化阅读的时代。如何从海量图书出版与数字内容中筛选出优秀作品和经典作品，提取真正富有传承价值的“种子基因”，是当前出版界亟待解决的事。

4. 夯实“三复校正”的出版编校

中国古人对出版编校的审核把关向来非常严格，彰显了对出版事业的崇高敬意。杜甫在《偶题》诗中云：“文章千古事，得失寸心知。作者皆殊列，名声岂浪垂。”这道出了古代文人对诗文之敬畏，深知其事关流传千秋万载，因此对内容把关审核会非常严格。《文选·魏都赋》中说：“雠校，一人读书，校其上下，得谬误为校。”建阳龙山书院刻印的宋代王明清《挥麈录》余话总目后所镌牌记：“敬三复校正，锓木以衍其传，览者幸鉴。”^[21]这里的“三复校正”就是中国古代印刷业的校对方法，宋代书院的出版人为提高印刷质量，进行了大量细致的校勘，并以此来保证出版物的内容质量，“开启了后世‘三审三校’先河”^[22]。

三审制是从20世纪50年代开始推行,其三审是指由责任编辑初审、编辑室主任复审、总编辑终审形成的三级审稿制度。这也是我国规定在出版机构内部要严格遵循的审稿制度。三校制是指从稿件编辑到最后签发,要经过专业校对人员至少完成3次校对。“三审三校”是制度,同样也是方法,能够帮助出版物最终以最佳效果呈现出来。设立这一制度的初衷,就是“完善编辑修改稿件时存在的失误、纰漏,从而形成环环相扣、层层递进的立体编审模式”^[23]。当下,各类数字传播平台以及人工智能生成内容的平台,在海量生产与快速发布中,如何用技术方式更好继承古人的审校与严谨,更是尤为重要。

四、结语

习近平总书记在文化传承发展座谈会上指出,中国文化源远流长,中华文明博大精深。只有全面深入了解中华文明的历史,才能更有效地推动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创造性转化、创新性发展,更有力地推进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建设^[24]。当前,构建中国出版学自主知识体系,要从中国古代出版中挖

掘其精神内核,并在历史传承中探源中华文明。

通过归纳梳理凝练独具中国特色的出版内核精神,可以发现,中国古代出版在精神内核上主要体现在内容主体追求“尊礼崇德”的道德追求,在出版活动上承载着“教化天下”的价值目标,出版编辑则不断发展出“博大精深”的内涵,在为出版为文上则是“文心雕龙”的出版匠心,在出版辨正上则是讲究“考镜源流”。从中国古代出版的传承逻辑上看,主要是起源于“巫祝史录”,从文人士大夫个人角度注重“记功续绝”的出版传承,出版工艺上则是追求“镂月裁云”的艺术造诣,从国家层面则有“盛世修典”的出版传统,技术上则不断进行“革故鼎新”的追寻。

从古至今,无论媒介如何迭代,符号如何改变,中国古代出版的精神内核及风貌都一脉相承,历久弥新,为数智时代继续赓续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提供了宝贵的思想源泉和发展动力。当今出版人应对中国古代出版精神进一步深入理解和体悟,汲取其中智慧,更好地发挥中华文明的优势和特色,为推动中华文化繁荣发展贡献出版力量。

(作者单位:合肥工业大学文法学院 北京师范大学新闻传播学院)

参考文献:

- [1][2] 万安伦. 中外出版史[M]. 北京: 高等教育出版社, 2017: 3.
- [3] 吴永贵. 中国出版史[M]. 长沙: 湖南大学出版社, 2008: 30.
- [4] 章太炎. 国故论衡[M]. 上海: 上海古籍出版社, 2006: 55.
- [5] 范文澜. 文心雕龙注[M]. 北京: 人民文学出版社, 2006: 725.
- [6] 闰月珍. 器物之喻与中国文学批评——以《文心雕龙》为中心[J]. 中国社会科学, 2013(6): 167-185+208.
- [7] 钱存训. 中国古代书籍纸墨及印刷术[M]. 北京: 北京图书馆出版社, 2002: 4.
- [8] 肖东发. 中国图书出版印刷史论[M]. 北京: 北京大学出版社, 2001: 10.
- [9] 鲁迅. 集外集选本[M]. 见《鲁迅全集》第七卷, 北京: 人民文学出版社, 1981: 13.
- [10] 徐迅. 从十竹斋到荣宝斋——短版的产生、发展及影响[J]. 图书情报与数字图书馆, 1986(4): 101-104+149.
- [11] [明] 谢陞, [明] 张涛修. (万历) 歙志: 卷九: 艺能[M]. 中国国家图书馆藏(明刻本): 11.
- [12] 王应麟. 玉海(卷54)[M]. 南京: 江苏古籍出版社, 1988: 1032.
- [13] 杜伟生. 《永乐大典》修复始末[J]. 国家图书馆学刊, 2004(2): 64-68.
- [14] 谢灼华. 中国图书和图书馆史[M]. 武汉: 武汉大学出版社, 1987: 207.
- [15] 郑也夫. 造纸术的起源[J]. 北京社会科学, 2015(7): 4-15.
- [16] 王利器. 颜氏家训集解[M]. 北京: 中华书局, 1993: 55.
- [17] 杨梅. 敬惜字纸信仰论[J]. 四川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 2007(6): 57-65.
- [18] 黄鸿山. 何以为善: 清代惜字会功能新探[J]. 史学月刊, 2019(5): 30-32.
- [19] 习近平. 全面推进乡村振兴 为实现农业农村现代化而不懈奋斗[N]. 人民日报, 2022-10-29(4).
- [20] 习近平. 习近平在联合国教科文组织总部的演讲[N]. 人民日报, 2014-3-28(3).
- [21] 林申清. 宋元书刻牌记图录[M]. 北京: 北京图书馆出版社, 1999: 16.
- [22] 万安伦, 翟钦奇, 周杨. 论宋代书院刻书的风貌、特色、价值与启示[J]. 出版发行研究, 2019(11): 106-111.
- [23] 曹建, 杨晓方. “三审三校”提升学术出版质量策略研究[J]. 中国出版, 2018(10): 3-6.
- [24] 习近平. 习近平在文化传承发展座谈会上强调 担负起新的文化使命 努力建设中华民族现代文明[N]. 人民日报, 2023-06-03(1).